让法治成为国家信仰·专题策划

编者按: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决定》中指出:“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这标志着,“党要守法”,成为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和共识。2014年12月4日,13亿中国人迎来了第一个“国家宪法日”。首个“国家宪法日”将“法治成为国家信仰”作为主题。从此,法治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途径。每个公民都有了公平的基石,人权有了坚强的保障。落实到民族地区,法治的最大体现是《民族区域自治法》。如何让《民族区域自治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刊特推出“让法治成为国家信仰专题策划”,邀请我州著名专家、学者,对此展开讨论。敬请关注。

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保障文化发展

藏学家根秋登子。

■本报记者 赵敏

A

著名藏学家根秋登子说,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的讲话过程中,他拿着一支红色铅笔勾重点划红线。

他认为,习总书记讲话有的放矢,对于民族地区落实依法治国具有很强指导性。

根秋登子不光从事大量的汉译藏的法律文本翻译工作,更有幸参加两次《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改。他还参加过《宗教事务条例》修改与翻译以及《计划生育条例》的修改与翻译,亲自撰写《民族语言文字条例》九次。

根秋登子在我州整整生活45个年头,对在高寒恶劣环境中广大农牧民群众的艰苦生活深有体会。所以,关于法治成为共同信仰,他着重强调了民生方面的法律保障问题。

《民族区域自治法》二十八条专门谈到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问题。那么,怎样充分运用《民族区域自治法》将我州的资源开发与广大农牧民群众的生活很好结合在一起,这是各级党委政府都要关心和考虑的问题。

根秋登子说,有些开发商开发我州资源,急功近利,只看重自己是否赚钱,并没有考虑如何安排当地广大农牧民群众生活。他们往往采取一次性支付的方式就可以进行资源开发,没有顾及广大农牧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更没有考虑如何保护好当地的生态资源。老乡们祖祖辈辈在当地生活,在资源开发过程中,他们应不应当得到利益?究竟应当得到怎样的利益?

横断山有四条大江,有十分丰富的水利资源,其它资源更是应有尽有,甘孜州有这么多资源,只是没有钱,也没有技术力量来开发,能不能够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相关规定制定条例,让当地老百姓资源入股,以保障老百姓的长远利益。

九寨沟为开发当地旅游资源,让当地老百姓采取资源入股方式,老百姓都很满意,不光有长远收入,同时还带动当地就业。

此外,根秋登子还发现《计划生育条例》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少数有钱人可以多生,只要交得起罚款就行,没钱的人不能多生,让一些人认为相关法规只认钱不认人。

根秋登子说,顶层设计要做到既实用又管用。不能在可行性上总体来说起作用,在具体问题上不起作用。不论有权没权,有钱没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B

民生如何改善?根秋登子认为,根本出路在于民族手工艺。

根秋登子说,要让藏民族的文化发扬光大,一定要站在全球化高度来认识。成都市的人口有1200万,而藏民族只有600多万人,却在雪域高原的高寒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当然要更好地弘扬和发展。

现在,全世界都在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就是基于西方物质文明过于强大,大家都向西方学习。如果汉族人学习西方,而不注重自己的儒家文化;藏族人学习汉族文化,而不继承藏民族的优秀文化,那么,中华民族怎么能够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梦何以实现?

根秋登子说,依法治国,为大力传承民族文化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的强大,首先是精神文明的强大,这就是他学习习总书记讲话最重要的心得体会。

他还说,只有依靠藏民族特殊的文化背景,加上美如天仙的自然环境,整个藏区才会成为全世界旅游目的地。

他说,中央要求,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州靠什么?虫草、松茸没有了怎么办?

当然要靠可以提供长期支撑的藏文化。

比如以藏文化为依托的传统手工艺,某些人看不上眼。但我州没有产业化的大型企业,也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发展民族手工艺就是发展经济的一条很好的出路。

传统手工艺来自民间,老百姓对它有感情。不需要很高文化素质就可以学会,在现今就业难的情况下尤为有用。

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安定团结,这是政治上的意义。利用传统手工艺的传帮带,藏文化也能得到传承和弘扬,这是文化上的意义。

比如唐卡画,应当成立中国唐卡艺术研究中心。此外,可以将唐卡当成产业来做。过去唐卡是作坊式生产,现在的老板们觉得不满足,他们开公司,加强对外交流,学电脑,学外语,学网络,学汉语,全方位发展,不光增加当地人收入,更带动当地人文化素质的提高。这样,当地人看问题的方式和视野都更全面了,和过去完全不一样。

根秋登子说,他对民族手工艺研究了14年。从木里开始,围着整个藏区转了五圈。不丹、锡金、尼泊尔、内蒙和外蒙的博物馆都参观过。由根秋登子主编的《藏族手工艺大全》于2010年出版后,获得全国优秀图书二等奖。

他说,尼泊尔的手工艺相当发达,但根据海关统计,95%以上都是藏族手工艺。根秋登子亲眼看到,尼泊尔一个小小的个体户,仅四年时间,就成了身家过亿的大老板。我州传统手工艺既传统又正宗,别人仿造都能够发财,我们更应理直气壮地发展民族手工艺。此外,藏餐也很有前景。一些人对藏族人的饮食文化存在误解,认为藏餐油腻、种类少,但不少高鼻子洋人都喜欢吃藏餐,说明藏餐不光在我国,在全世界都很有前途。

根秋登子最后建议,组织专家队伍,对我州文化事业做深入调研,并形成相关法规,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保障文化发展,保障民生改善。

将《民族区域自治法》落实到人民生产生活中

藏学家杨嘉铭。

■本报记者 赵敏

著名藏学家杨嘉铭首先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之间的关系。他说,《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而《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依据《宪法》制定的,具有无可辨驳的权威性,同时也尊重中华民族是多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家庭的历史事实,所以《民族区域自治法》就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大法,只有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办事,才能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他说,中央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在我州开展学习《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活动,不仅各级领导带头认真学,广大群众也要认真学,做到所有内容都能耳熟能详,在实际工作中严格对照,不能偏离。不论经济发展还是社会稳定,都要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办事。

杨嘉铭说,今后,不论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依法制定经济民生等相关条例,一定要和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才是实事求是的顶层设计。这样的“顶层设计”一旦完成,就不能因人的意志而改变,不能因换届或暂时的困难,轻易地突破它的历史使命。

A

如何做到法规条例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杨嘉铭举了几个例子。

《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上级国家机关应当把民族自治地方的重大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的综合治理工程项目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统一部署。民族自治地方为国家的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作出贡献的,国家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任何组织和个人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进行建设的时候,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改善当地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杨嘉铭说,四川三州地区不仅是四川最大的林区和最大草原所在地,同时也是我国第三大林区的重要组成部份,以及青藏高原东部核心草原地区。在六大江河流域中,我州就占三个: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天保工程”实施以来,成效十分显著。但需要指出的是,首先,我州多数县都是贫困县,国家对“退耕还林”和“退牧还草”的农牧民补贴需要继续延长。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物价上涨,还应相应提高补贴标准。其次,在水利资源和矿产资源方面,其建设成本必须考虑生态复原部份。在设计施工过程中,需将生态复原纳入规划和监管体系之中。

《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且注意在少数民族妇女中培养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杨嘉铭指出,在我州,青稞和药材还处于粗放式经营阶段,在牧区,“草越长越浅,牛越长越小”,牲畜“秋肥冬瘦春死亡”,草场退化问题至今仍是老大难问题。过去,国家和地方在资金和物力方面并没有少投入,究其原因,主要是地方科技队伍薄弱,难以完成如此科技含量高、攻关难度大的草原科技建设项目。在农区,针对山地,高原的特点,开展适合山地、高原农作物的研发也存在薄弱环节。因此,应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大力培养我州急需的科技人才。

杨嘉铭认为,我州虽然地广人稀,但土地资源十分丰富。科学种田,大有可为。所以,建议在牧区确定草场改良、畜种改良、疫情防治、畜产品综合开发等一系列项目。在农区,也应确定一批农作物品种改良、经济作物示范区建设以及适合山地和高原生长的优良经济作物的引进等项目,由农业部统筹,由愿意献身高原特色农牧业的知名专家领衔,整合相关研究院所和高等院校科研力量,进行攻关和科技推广,力争在五到十年间大见成效。与此同时,还应加大科技投入的还有我州的药材生产。

《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的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民族文化事业,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加强文化设施建设,加快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杨嘉铭说,近年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下,国家先后出台一系列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文件,以强化这方面的工作。州委和州政府十分重视,而且努力做了大量相关工作,今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如何发扬光大民族文化。杨嘉铭说,习总书记强调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要沾满铜臭气。对此,他深有体会。过去谈到文化产业,多侧重于文化如何赚钱。现在看来,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文化观,以健康向上的文化来引领人、鼓舞人,才能带动文化产业可持续和健康发展。有了充满正能量的文化指引,我州的演艺业才能在康巴大地作好文化创新的领头羊和文化产业的排头兵,才能够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并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和影响。

杨嘉铭认为,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今天,需依托博大精深的康巴文化。他认为,有了高水准、正能量的文化产业作为支撑,才能将康巴建设成为高品味的旅游目的地。他说,我州提出建立香格里拉旅游核心圈,要搞好这样的经济旅游带,一定要搞好规划,突出重点,形成我州的拳头产品。亚丁能否达到和超过九寨沟的水平,成为国际级景点,将是衡量这一目标是否达到的重要标准。

B

对于一个从事藏学研究的人,杨嘉铭关注的还是民族文化的发展。

杨嘉铭说,藏民族自身的优秀文化就是通过信仰与文化的整合,使得藏族人与自己居住的每一片山水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在工业化生产如此繁重的今天,地球本身的环境变得如此脆弱,很容易遭到破坏。而在藏民族聚居区,野生动物、森林资源等都是靠信仰和文化保护下来。藏人们都知道,鹿子杀了,肉可以吃,鹿茸可以卖钱,但他们都明了所有生命都是上天赐予的,不可以随便猎杀,而每一片山水都有神灵眷佑,所以,树苗茁壮成长,没有人去砍伐它们。朱镕基总理曾说:我们不是地球上最后一代人,要给后人留点东西。因此,继承和弘扬藏民族的优秀文化尤为重要。让信仰和文化相结合,保护好人文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在眉睫的大事。这都需要以法律来保障。

最后,对怎样保证《民族区域自治法》落实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和文化各方面,杨嘉铭先生谈了他的看法。他从事教育多年,专门就教育提出几条补充建议。他说,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我州要在中小学教育中,重视藏汉双语教育。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内地高校的优秀毕业生来我州任教。选送优秀青年教师到全国一流大学进修,聘请内地优秀教师到我州示范教学。加大远程教学力度。更重要的是,我州的职业教育还比较薄弱,要针对农牧业基础产业和第三产业兴建职业培训学校,为他们自主创业或竞争上岗提供有力支持。

五色海·特刊

——第760期——

评论

让“法治成为国家信仰”

■ 本报记者 王朝书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纲要,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当今,中华民族正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全力以赴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其有效途径便是,法治成为国家及人民的信仰。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56年,这一任务被写进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党章。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两步走”的构想。从那以后,四个现代化便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战略目标,成为全体中国人民自觉行动的口号。

四个现代化建立在对“现代化”一词理解的基础之上。中华民族对现代化的认识,是渐进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逐步认识到四个现代化不是现代化的全部内容,还应包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1987年以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取代了“四个现代化”。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2014年,习近平在继四个现代化后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是中华民族进入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的关键。

纵观人类历史,现代社会是人类文明一次高度的结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古代社会其社会结构是,经济基础、军队、王法及顶层的皇权;近代社会其社会结构是,经济基础、军队和警察、法制及顶层的国家政权;现代社会其社会结构是,经济基础与民主政治即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与以宪法为根本的法治。

在古代社会,因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力低下,生产方式均一雷同,因此,能组织大规模人力、物力以抵御天灾人祸以及高度集权的皇权专制应运而生。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与欧洲启蒙运动,掀起了世界近代史波澜壮阔的宏伟篇章。工业革命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作,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人从生存压倒一切的命运中获得了根本性的解放,个体独立的人的意识以及法的精神在公民中得到普及。古代社会的王法及专制皇权,在近代,被法制及国家政权所取代。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拉开了人类现代史的序幕,人类在灾难和梦想中,随后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法治取代人治成为政治运行的基本方式。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核心在于终结人治,开启法治。在法治建设的道路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民族均付出过惨痛代价,但终究探索出了一条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法治之路。1949年,体现全国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成为中国法治道路的原点。1954年,第一部宪法颁行,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从过渡期走向成型期,并奠定了依宪治国的基础。1978年,改革开放重启中国法治进程,法治建设进入快车道。截至2014年3月,我国现行有效法律,已经达到242部。一部部涵盖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法律在宪法的指导下,从无到有,并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然而,“文革”时期,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不能保护国家主席免于冤屈的惨痛警示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一个绕不过去的难题是:党与法的关系。

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决定》中指出:“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这标志着,“党要守法”,成为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和共识。

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对党与法的关系,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党来自于人民,因此,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一切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此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也是相互依存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党的领导体现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

2014年12月4日,13亿中国人迎来了第一个“国家宪法日”。首个“国家宪法日”将“法治成为国家信仰”作为主题。法治成为国家信仰,意味着宪法的权威必将深入人心,且内化为“有法必依”的公民道德,外化为“执法必严”的社会习俗,凝聚为“违法必究”的法治共识。法治成为国家信仰,意味着人的时代的全面到来,意味着我国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领域全面开启法治。如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定会得以实现。